

基于教育高阶理论和资源诅咒理论双重视角的 “海归”董事与企业创新研究^①

傅小敬

西南大学 财务处, 重庆 400715

摘要: 基于教育高阶理论与资源诅咒理论, 结合咨询建议职能, 对“海归”董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 “海归”董事通过发挥咨询建议功能, 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聘任“海归”董事及独立董事, 能够显著促进创新产出。在处理内生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该文进一步探讨了“海归”董事促进创新可能的影响机制, 探讨了“海归”董事根据既往从业经验对企业创新产生的积极影响。该研究从全新角度印证了“海归”董事对企业创新和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海归”董事; 咨询职能; 创新产出; 从业经验影响

中图分类号: F40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71(2020)05-0072-08

“大国角逐, 比的就是高端人才”^[1]。无论是“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 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均需要人才提供智力支持^[2]。创新是驱动实体经济兴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有效途径, 也是经济组织持续获得超额利润的重要保证^[3]。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以往“成本红利”“人口红利”边际贡献递减趋势渐强, 企业必须依靠人才及其贡献的创新成果才能在日益严峻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 这使得具有海外教育及从业背景的人员受到青睐, 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招聘和任用创新性人才。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 年各类留学归国就业人员总数超过 50 万人, “海归”回国热潮持续升温, 多数“海归”对企业和社会的创新式发展做出了有益贡献。

在海归大潮中, “海归”董事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支群体。这是因为“海归”董事自带前沿、专业、权威等独特标签, 一度被视为人才驱动创新的重要动力源, 加之《公司法》赋予其监督高管人员和提供专业咨询建议的权利, “海归”董事毫无疑问成为企业决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 其是否能够凭借自身宽广的视野、丰富的阅历和专业知识的推动企业创新, 亟待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通过对 A 股主板企业的统计发现, 2012—2017 年间近 30% 的上市公司选聘了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 且发挥其“鲶鱼效应”是做出聘用决策的关键动因之一。特别是经股东大会选出、负责公司日常运作和管理工作的董事, 在创新等战略决策中发挥咨询、监督作用, 很可能对企业创新活动造成显著影响, 而既往文献却鲜有涉及^[4]。鉴于此, 本文有别于传统董事履职文献, 基于国别背景角度, 运用教育高阶理论和资源诅咒理论, 探讨特殊董事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①专注于“新兴+转轨”市场中“海归”董事履职视角, 对成熟市场情境下董事文献进行了一定补充, 有助于全面洞悉特殊董事在不同市场中发挥的作用; ②考察了具有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增补了驱动创新文献, 有助于经济组织合理发挥“海归”董事的创新效应, 促进企业顺利转型升级; ③本研究对当前国家倡导、企业实行的“海归战略”具有积极的

① 收稿日期: 2019-10-21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SWU1709308)。

作者简介: 傅小敬(1986—), 女, 硕士, 会计师, 主要从事财务会计研究。

实践意义，不仅从特定视角为“人才强国”“人才强企”行动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印证了海外背景人才为当今国内现代化建设发挥的积极作用。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1 相关文献回顾

在企业组织结构中，董事会与股东会占据权力高点，直接影响着企业的重大战略选择与关键经营管理事项。董事会不仅拥有较大的裁量权，还具有监督高管人员、提出咨询建议的职能^[5]，在企业并购、融资、经营、创新等方面能够施加显著影响。然而，董事会能否恰当、充分地履行其职却取决于董事个人，其特质与能力才是整个机构有效履职的关键，“新兴+转轨”的市场经济国家更为明显。在转轨经济体中，各行业经济组织急需了解普适性市场规则和境内外市场差异，尤其期望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适应市场环境，进而实现更广阔的市场目标，特殊董事的出现使之成为可能。既往主流研究成果显示，多数董事能够积极发挥咨询建议功能，显著提升了所在单位的内部治理、经济效益、整体价值^[6]，但是否影响创新活动却未有实证检验^[7]。

仅就董事咨询建议职能履行效果而言，多数董事所表现出的独立性以及专业胜任能力对企业价值实现与提质增效具有积极意义^[8]。同时，董事自身背景也显著影响着其咨询建议职能的发挥，例如董事学历水平、工作经历、特定身份亦会决定其履职能力^[9]，进而带来董事会整体治理水平乃至组织发展的不同结果。此外，以市场类型为界限，多数文献聚焦于成熟市场中董事咨询建议作用的考察，发现发达国家董事较好地履行了经济法规要求承担的应尽义务，且上述董事与企业并购活动、融资活动、战略制定、薪酬计划等事项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0]。

已有关于董事咨询建议履职作用及经济后果的文献报道，这为本文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现有文献鲜有从文化与经历角度探讨董事咨询职能，特别是少有对海外背景董事科技咨询履职效应的实证研究。本文着重探讨“海归”这一特殊董事的履职情况对创新的影响。

1.2 理论分析和假说

教育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人的认知是有限的，经济组织中决策者的战略制定与实施并非完全理性，其深受决策人教育背景、主观认知、既往经历、价值偏好的影响，并最终作用于企业绩效及产出。在新兴市场中，“海归”董事具有一定的稀缺性，独特的海外教育背景、工作阅历或价值理念使其较一般管理层更有提供咨询建议的话语权^[11]，在深刻认识、踊跃倡导创新对企业发展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也更有动机推动重大创新项目实施。再者，“海外”董事独特的求学和从业经历易使之形成科学决策意识及创新认同感^[12]，能够将既往的海外创新思想、经验运用到履职企业实践中，并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积极提供与创新相关的咨询建议，进而在企业发展决策中对创新活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换言之，“海归”董事拥有的境外求学、创业、就业等经历丰富了董事会及创新决策群的视野与洞见，不仅营造了创新氛围，推进了创新活动开展，同时以自身异质性能力拓宽了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了创新风险承受力及包容度，激发了创新项目增加与产出。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1。

研究假说 1：聘任“海归”董事能显著增强企业创新产出。

资源诅咒理论(Resource Curse Theory)认为，包括政治资源在内的经济组织拥有或控制的各类资源，可能导致经济组织过分依赖禀赋资源，偏离正确发展路径，最终陷入停滞状态。袁建国等^[13]的研究表明，政治资源禀赋企业更可能受到政府干预，同时以“迎合”的方式挤占自身的研发资源，引致正常创新行为的扭曲。相较本土独立董事，“海归”独立董事与国内的联系较弱，对国内人情世故的追捧程度更低^[10,14]，且更加认同“市场之手”而非“政府之手”，因而会极力排斥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即会制止管理层将有限资源过度投入至“政策庇护”或“外部保护”领域，并向决策层不断提供“创新强企”的咨询建议，促进企业创新式发展。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1]102 号文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多由专长型专家担任^[15]，而拥有海外求学和从业背景的专长型独立董事更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有动力发挥咨询建议职能，传递创新而非行政保护、资源垄断等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信号，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意识，强化创新投入与产出。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2。

研究假说 2: 聘任“海归”独立董事能显著增强企业创新产出。

2 数据、变量与模型

2.1 数据来源

全文的样本期间为 2012—2017 年, 初始样本来源于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 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整理后, 用以实证检验的观测值共有 8 407 个, 主要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而诸如上市公司董事境外背景、专利申请等少数数据则分别由手工查询、整理财务年报以及国家知识产权系统得到。此外, 作为研究重点的“海归”董事, 本文与已有主流文献保持一致, 将其定义为在非大陆地区拥有学习、工作经历的董事。

2.2 变量设计

2.2.1 创新变量

企业创新以产出为导向, 主要表现为可量化的专利。本文参考蒋艳辉等^[4]的做法, 采用发明专利申请(IP)与全部专利申请(AP)作为创新变量的代理指标, 考虑如下: ①我国专利按类别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 其中发明专利最能突显科技创新成效; ②发明专利申请总量与全部专利申请总量能够较好地表征创新效率与质量^[16], 数据可靠性高, 有利于全面考察“海归”董事对创新的双重影响。

2.2.2 解释变量

关于“海归”董事变量的代理指标选取, 考虑不同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差异, 从绝对数和相对数角度出发刻画海外背景董事状况。在综合参考魏刚等^[8]、温军等^[9]、王化成等^[10]研究的基础上, 选取是否存在海外背景董事(OD)、是否存在海外背景独立董事(OID)作为我国“海归”董事代理变量。上述指标越大, “海归”董事咨询功能发挥越充分。

2.2.3 控制变量

为抑制公司层面其他影响因素对创新产出的作用, 借鉴刘柏等^[11]、谢获宝等^[12]的做法, 控制了既往文献中提及的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变量, 这些控制变量包括: ①企业财务类指标, 资产报酬率(Roa)、成长性(Growth); ②企业特征类指标, 杠杆率(Leverage)、规模(Size)、上市年限(Age)、产权性质(Soe); ③企业治理类指标, 管理层持股比例(Mo)、机构持股比例(Io)。

各类变量界定及测度方式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测度表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测 度
被解释变量: 创新产出	<i>Invention</i>	
单项发明专利	<i>Invention patent (IP)</i>	以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为基础, 采用+1 取对数方式变形
全部专利	<i>All patents (AP)</i>	以全部专利申请数量为基础, 采用+1 取对数方式变形
解释变量: 海外背景董事	<i>Returnees director (RD)</i>	
是否存在海外背景董事	<i>Overseas director (OD)</i>	存在海外背景董事为 1, 否则为 0
是否存在海外背景独立董事	<i>Overseas independent director (OID)</i>	存在海外背景独立董事为 1, 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资产报酬率	<i>Roa</i>	上市公司年度净利润/资产总额×100%
成长性	<i>Growth</i>	上市公司本年度较上年度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度营业收入×100%
杠杆率	<i>Leverage</i>	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100%
规模	<i>Size</i>	以上市公司资产总额为基础, 采用取对数方式变形
上市年限	<i>Age</i>	以上市年限为基础, 采用+1 取对数方式变形
产权性质	<i>Soe</i>	国有性质上市公司为 1, 否则为 0
管理层持股比例	<i>Mo</i>	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数量/上市公司总股数
机构持股比例	<i>Io</i>	机构持股数量/上市公司总股数

2.3 模型设定

为考察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参考权小锋等^[17]、孔东民等^[18]的模型设计, 设定以下回归模

型。考虑到专利产出可能与前期“海归”董事履行创新咨询职责有关，以变量滞后一期方式回归，进而缓解内生性问题。

$$Innovation_{i,t} = \beta_0 + \beta_1 RD_{i,t-1} + \beta_2 Controllers_{i,t-1} + \beta_3 \epsilon_{i,t}$$

(1)

3 估计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包括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极值在内的全文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 2。单项发明专利 *IP* 及全部专利 *AP* 均值分别为 0.479,0.800，中位数 0.000，表明样本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创新实力，但未达到高水平状态，这与我国企业专利申请现状保持一致。聘用海外背景董事 *OD* 与聘任“海归”独立董事 *OID* 均值各为 0.314,0.206，标准差 0.462,0.403，说明聘用“海归”董事及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不足样本的一半，透露出海外背景董事较稀缺。其他控制变量也符合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属性、治理特征，说明代理指标及数据统计具有合理性和可信用。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Mean	Median	Sd	Min	Max
被解释变量					
<i>IP</i>	0.479	0.000	0.854	0.000	2.681
<i>AP</i>	0.800	0.000	1.232	0.000	3.627
解释变量					
<i>OD</i>	0.314	0.000	0.462	0.000	1.000
<i>OID</i>	0.206	0.000	0.403	0.000	1.000
控制变量					
<i>Roa</i>	0.026	0.034	0.074	−0.409	0.175
<i>Growth</i>	0.102	0.125	0.346	−0.813	0.997
<i>Leverage</i>	0.214	0.200	0.153	0.000	0.491
<i>Size</i>	18.066	21.403	1.072	17.655	23.509
<i>Age</i>	13.317	14.000	5.041	1.000	34.000
<i>Soe</i>	0.012	0.000	0.270	0.000	1.000
<i>Mo</i>	0.014	0.000	0.052	0.000	0.269
<i>Io</i>	0.179	0.079	0.210	0.000	0.627

3.2 相关性统计

为揭示主要变量间多重共线性情况，同时初步印证“海归”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正式实证估计前，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各主要变量相关系数在 0.300 以下，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另外，Pearson,Spearman 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均显示，海外背景董事(*RD*)与企业创新产出(*Invention*)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海归”董事越多，上市公司创新产出越高，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海归”董事促进创新的假说。

3.3 基准模型估计

以单项发明专利 *IP* 及全部专利 *AP* 作为替代企业创新产出的被解释变量，将是否存在海外背景董事 *OD*、是否存在海外背景独立董事 *OID* 纳入模型，分别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p* 值为 0.000，拒绝了零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更佳。表 3 为控制行业和年份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其中(1)和(2)表示针对企业海外背景董事不同指标的回归结果。

从表 3 的实证检验结果可知：①聘用海外背景董事对上市公司发明专利及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显著为正，估计系数分别为 0.071,0.079，显著性水平 1%，表明聘任“海归”董事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意识，促进高科技含量的专利产出；②选聘具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亦对创新带来积极效应，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 0.763,0.277，说明“海归”独立董事在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咨询建议职能，有助于创新活动开展以及获取创新绩效。在实践中，不乏上市公司通过引入海外背景董事及独立董事促进创新产出的典型案例。例如，华能国际(600011)从 2014 年起选聘多位具有英美求学或海外从业经历的董事和独立董事，创新产出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4 年以前，该上市公司专利申请与授权数较少，其中 2012 年专利申请 2 项，专利授权

2 项; 2013 年专利申请 18 项, 专利授权亦为 2 项. 但自开始聘用海外独立董事的 2014 年以来, 其后各年专利申请分别为 22 项、51 项、90 项、92 项, 且专利授权数也保持增长势头, 历年专利授权分别是 7 项、24 项、46 项、50 项. 可见, 华能国际实施聘任海外董事及独董战略, 通过发挥其创新咨询与建议职能, 带来了显著的创新产出提升, 符合上述实证结果. 因此, 基准估计证实了上文提出的假说.

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 资产报酬率、管理层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财务业绩佳、公司治理好的上市公司创新产出普遍较高. 相对应地, 负债率高、成长性强、年龄大、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创新水平偏低. 这与温军等^[9]的研究一致.

表 3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IP_{i,t}$		$AP_{i,t}$	
	(1)	(2)	(1)	(2)
$OD_{i,t-1}$	0.071*** (2.79)		0.079*** (2.82)	
$OID_{i,t-1}$		0.763*** (2.80)	0.277*** (2.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是	是	是	是
<i>Year</i>	是	是	是	是
<i>N</i>	8 407	8 407	8 407	8 407
<i>Adj R</i> ²	0.31	0.37	0.35	0.31

注: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5$, * 表示 $p<0.1$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此外, 括号内为双尾 t 值. 下同.

3.4 稳健性测试

3.4.1 PSM 测试

以上基准模型估计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是: “海归”董事带来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由“海归”董事本身所致, 而是由公司和行业特征所造成, 因而需要对相应特征影响进行控制. 据此, 采用倾向匹配得分(PSM)方法, 将拥有“海归”董事划为处理组, 1:1 匹配未有“海归”董事的控制组, 得到 5 274 个总样本. 采用胡元木等^[19]的做法, 匹配依据主要有资产报酬率 Roa 、行业成长性 $Igrowth$ 、规模 $Isize$. 从表 4 的 PSM 有效性检测可看出, 匹配变量 t 值均不显著, 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基本公司与行业特征层面无显著差异. 表 5 为 PSM 测试结果, 可知, 在控制公司及行业特征下, “海龟”董事仍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测试结果削弱了内生性问题.

表 4 PSM 有效性检测结果

变量	均值		%bias	t -test	
	处理组	控制组		t	$p>t$
<i>Roa</i>	0.02	0.02	-2.90	-0.54	0.59
<i>Igrowth</i>	0.10	0.12	-2.50	-0.51	0.61
<i>Isize</i>	12.72	12.76	-4.20	-0.90	0.37

表 5 基于 PSM 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IP_{i,t}$		$AP_{i,t}$	
	(1)	(2)	(1)	(2)
$OD_{i,t-1}$	0.017*** (3.26)		0.014*** (3.82)	
$OID_{i,t-1}$		0.023*** (3.01)		0.019* (1.67)
公司及行业特征匹配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是	是	是	是
<i>Year</i>	是	是	是	是
<i>N</i>	5 274	5 274	5 274	5 274
<i>Adj R</i> ²	0.27	0.35	0.27	0.31

3.4.2 Heckman 两阶段测试

创新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本身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聘用思想开放、了解科技动态的海外背景董事来“出谋划策”。考虑到“海归”董事与创新之间可能因样本自选择(Self-Selection)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采用了 Heckman 两阶段法处理自选择偏误。通过上市公司聘用“海归”董事的 Probit 函数模型，以大股东持股占比、上市年限、杠杆率、资产报酬率、成长性、产权性质作为任用与否的影响因子^[20]，测算反米尔斯系数(IMR)，并将之纳入原模型予以控制，重新估计“海归”董事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基于 Heckman 模型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见表 6。由表 6 估计结果可知，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及独董能够显著促进创新产出，即“海归”董事和独立董事有利于上市公司创新。

表 6 基于 Heckman 模型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变量	$IP_{i,t}$		$AP_{i,t}$	
	(1)	(2)	(1)	(2)
$OD_{i,t-1}$	0.049* (1.86)		0.056* (1.88)	
$ND_{i,t-1}$		0.052** (2.30)		0.048*** (3.88)
IMR	1.065*** (3.28)	1.029*** (3.16)	0.900** (2.45)	1.022*** (3.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是	是	是	是
Year	是	是	是	是
N	8 407	8 407	8 407	8 407
Adj R ²	0.24	0.27	0.31	0.31

3.5 进一步机制分析

从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角度看，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关键，企业家拥有从业经验与艰苦工作是其进行创业和创新的法宝^[21]，因而“海归”董事可能通过运用既往从业中的创新经验来推动新单位创新活动科学开展。样本统计显示，我国上市公司中“海归”董事背景主要有求学型、从业型及交叉型董事。相较于仅具有求学经历的董事而言，具备境外从业经验的董事深知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易于在创新决策中掌握话语权，也更可能将海外优秀企业的创新经验应用于履职单位中。因而，在海外背景董事中，“海归”董事更可能通过境外从业经验来促进企业创新。表 7 为分组检验结果，其将海外背景董事细分为仅有海外从业背景、仅有海外求学背景、具有海外求学与从业双重背景 3 类，分别设置哑变量 PE,LE,PL，并作 Chow test 检验。从表 7 中可知，仅有海外从业背景、具有海外求学与从业双重背景的董事在 1%的水平上与创新变量正相关，而仅有海外求学背景则与 IP 在 10%水平正相关，且其与 AP 并不显著相关，这表明“海归”董事具有既往从业经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表 7 基于不同海外背景董事的估计结果

变量	$IP_{i,t}$			$AP_{i,t}$		
	(1)	(2)	(3)	(1)	(2)	(3)
$PE_{i,t-1}$	0.032*** (3.47)				0.103*** (3.19)	
$LE_{i,t-1}$		0.019* (1.86)		0.005 (1.17)		
$PL_{i,t-1}$			0.035*** (3.14)		0.133*** (3.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7 803	7 803	7 803	7 803	7 803	7 803
Adj R ²	0.33	0.31	0.29	0.30	0.28	0.31

4 结 语

4.1 研究结论

①“海归”董事发挥咨询建议功能,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上市公司聘任“海归”董事及独立董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且利用 PSM 及 Heckman 两阶段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②探讨了“海归”董事促进创新可能的影响机制,从业型董事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表明“海归”董事根据既往从业经验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实证结果支持了“海归董事有用观”.

4.2 政策建议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国家应加强海外人才引进战略,给予具有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海外人才一定优厚待遇,使之回国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为企业转型升级、优化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提供智力与经验支持.

2) 传统行业应树立“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摒弃以往高污染、高耗能的经营方式,将有限的资源合理投入至创新等更能促进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和核心竞争力的领域,确保传统行业焕发新的活力.

3) 企业应充分重视“海归”董事在企业重大创新和跨越式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适当提升董事会中“海归”董事的人数及占比,并营造良好的咨询建议氛围,保证“海归”董事能够发挥聪明才智服务于企业.

参考文献:

- [1] 新华网.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EB/OL]. (2017-10-18)[2019-03-0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18/c_1121822489.htm.
- [2] 李克强. 政府工作报告 [N]. 人民日报, 2018-03-23(01).
- [3] 何帆, 刘红霞. 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 [J]. 改革, 2019(4): 137-148.
- [4] 蒋艳辉, 曾倩芳, 冯楚建, 等. 非高管型海归、本土科技人才与企业突破性创新——来自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J]. 中国软科学, 2018(2): 149-159.
- [5] PORTER M E. Capital Disadvantage: America's Failing Capital Investment System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1, 70(5): 65-82.
- [6] GUTHRIE K, SOKOLOWSKY J, WAN KAMM. CEO Compensation and Board Structure Revisited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2, 67(3): 1149-1168.
- [7] BENMELECH E, FRYDMAN C. Military CEO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117(1): 43-59.
- [8] 魏刚, 肖泽忠, Nick Travlos, 等. 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 [J]. 经济研究, 2007, 42(3): 92-105.
- [9] 温军, 冯根福. 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 [J]. 经济研究, 2012, 47(3): 53-64.
- [10] 王化成, 王裕, 胡静静, 等. 独立董事的海外背景与高管薪酬契约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7(3): 67-75.
- [11] 刘柏, 郭书妍.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J]. 管理科学, 2017, 30(3): 23-34.
- [12] 谢获宝, 丁龙飞, 廖珂. 海外背景董事与债务融资成本——基于董事会咨询和监督职能的中介效应 [J]. 管理评论, 2019, 31(11): 202-211.
- [13] 袁建国, 后青松, 程晨. 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 [J]. 管理世界, 2015(1): 139-155.
- [14] 王德宏, 文雯, 宋建波. 董事海外背景能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金融评论, 2018, 10(3): 52-69.
- [15] 陈东杰, 陈佳, 刘力. 海归董事与投资者关系——基于 2000—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分析 [J]. 经济科学, 2018(4): 103-116.
- [16] 赵奇锋, 赵文哲, 卢荻, 等. 博彩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化视角的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8, 39(9): 122-140.
- [17] 权小锋, 尹洪英. 中国式卖空机制与公司创新——基于融资融券分步扩容的自然实验 [J]. 管理世界, 2017(1): 128-144.
- [18] 孔东民, 徐茗丽, 孔高文.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创新 [J]. 经济研究, 2017, 52(10): 144-157.

- [19] 胡元木, 纪 端. 董事技术专长、创新效率与企业绩效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20(3): 40-52.
- [20] GIANNETTI M, LIAO G, YU X. The Brain Gain of Corporate Boards: Evidence from China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4): 1629-1682.
- [21] 代 明, 殷仪金, 戴谢尔. 创新理论: 1912—2012——纪念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首版 100 周年 [J]. 经济学动态, 2012(4): 143-150.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by “Overseas Returnee” Directors on the Basis of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d Resource Curse Theory

FU Xiao-jing

Finance Offic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hether “overseas returnees” are worthy and whether they can play a role i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as aroused discuss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d resource curse theory,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is paper on how the “overseas returnees” directors exert their advisory function to influence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enterprises. It has been found in the research that the “overseas returnees” director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advisory and suggestion. Those enterprises that employ “overseas returnees” directors or independent directors, its innovation output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dealing with endogenous problems, the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Furthermore, it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e paper that the possibl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verseas returnees” directors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overseas returnees” director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previous experience. In this study, the question has actively been answered of the role of “overseas returnees” directors in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duced the public’s excessive worries about the appointment of “overseas returne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thickens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n the consequences and mechanism of director driven innovation.

Key words: the “returnee” directors; advisory function; innovation output; impact on th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责任编辑 夏 娟